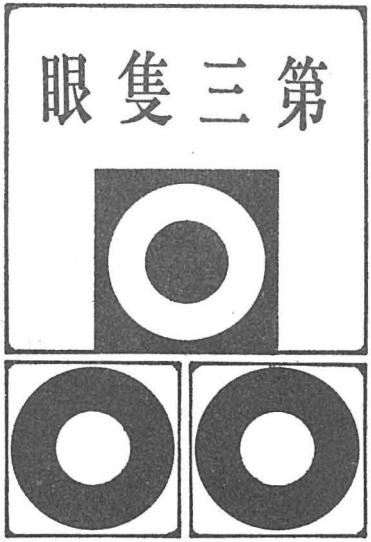

森林與樹

談「人子」，鹿橋著

民國六十三年九月初版，遠景出版社

1章法結構的可行性：「人子」包括十幾個短篇，又可合成一個長篇。從「汪洋」開端，以「渾沌」團圓，「不成人子」是加註的一個標點。這種章法顯然不同於我們所熟知的系列小說，它企圖打破長短篇的結構限制，使二者合而爲一。分開來是許多獨立的短篇，合起來又是一部完整的長篇，見了樹又要見森林，吃了熊掌還要吃魚。如果這種方法可行，對小說作者來說，是一個有趣的遊戲。問題是：行得通嗎？

看過「人子」以後，忍不住要叫：行不得也，哥哥。

不論你拿短篇小說的哪一條規矩來看，那篇「渾沌」絕對不是短篇小說，它是一種四不像，詩不是詩，散文不是散文，戲不是戲，小說不是小說。它是許多篇東西的旁白或者是結論，用一種奇怪的方法把它表示出來，然後再奇怪的把它們集合起來，是一個熱

鬧非凡的大團圓局面。

有了這篇東西，吃魚又吃熊掌就不能理直氣壯了。如果我們再看開頭的「汪洋」，就會知道這種道理。「汪洋」是兩種東西混合而成的，前半段，是散文，後半段才是小說，如果把整篇稱做散文，總覺得還要加上一個結論才像。

所以說，這種結構行不通。如果把大團圓的思想去掉，每篇都弄成乾乾淨淨的短篇，或許更純眞可愛。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是男人又是女人，總是一種缺陷。看得見森林的全貌，就看不清每棵樹的樣子，看得清每棵樹，就看不清森林，如果兩者都可同時看見，那麼，樹一定很少，一定不高，像這樣的小森林，就沒什麼看頭了。

2「人子」沒有國界，沒有特定的時間，人物，地點，它不是寫某個地方的某些人，而是摒棄所有的種族觀念與地域觀念，爲全人類的心靈服務，直接向人性打招呼。這種世界性的題材，選用寓言故事來表達是上上之策。不過，對象既然是全人類，寫的是人類的通性，那麼，以東方的哲學思想做視點，就難免有東方的色彩了。有東方的色彩也沒有什麼，誰都可以用任何眼光去看任何事物，可是，既然這些東西是東方的，我們爲什麼不讓它與東方的土地相結合？我一向不認爲用東方的思想去寫東方的人時地事物就無法表達世界性的原理原則，那又何必刻意去避免地理背景與人文背景？當然，作者這樣的寫法沒有什麼不可以，並不足構成作品的缺點，但在作品以外，就不必去强調這些問題。文學作品一旦遠離土地與人羣，就變成傳達哲學理念的工具了。哲學的成份越多，藝術的成份就越少。對於人類來說，藝術比哲學更富有同情與體諒。

3這篇短文絕對無意抹煞「人子」的成就，事實上，那是一本值得一看的書，它的好處別人說得很多，我不必重複。我認爲書評家應該把作品的得失作嚴肅公正的評論檢討，而不應止於重述書中的故事或解說故事的含意，已發表的幾篇有關「人子」的評論文字都不够認眞，沒有把「人子」所展示的問題挖掘出來，加以分析比較。二月六日，七日，胡蘭成先生在人間副刊「評人子」認爲「我們之中惟有鹿橋是最有可能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我十分不贊成他的說法。我們可以說某人最可能如何如何，但應列舉「最

可能」的充分條件。拿鹿橋的「未央歌」跟「人子」來說，這種「可能」是不够充分的。一個負責任的書評家，切不可把這種隆重的讚語輕易地，像哄孩子那樣的說着玩。（邊疆）

相思便是春常在

讀「槐園夢憶」，梁實秋著

民國六十四年二月出版，遠東圖書公司

雖然「槐園夢憶」祇不過是薄薄一百零三頁的小書，但是它所傳達給我們的消息，則不僅是來自其文字的浮面，也不盡然是梁實秋先生的喪偶之痛，而是更深一層的，讓我們體諒到一份純樸並且結實的愛。

在雷馬克的「凱旋門」中，一個酒店的司閽者這樣說道：「據我看來，祇有那些古老的希臘人纔有喝酒的神祇，和生活的享樂：貝祖師和戴奧尼塞斯。可是現在啊，我們就祇有佛洛伊德，那低劣的變態心理和精神的分析。」多令人遺憾的一個時代！自從人類被機器奴役了以後，不只是我們遺失了生活，同時也失去了賴以生活的人底原情。陳世驤先生說中國的文學係以「抒情」爲傳統，然而放眼看去，我們竟然不知道到底還有多少抒情的成分餘留在我們的文學裏。

梁實秋先生在寫作這本回憶錄之先，我想他倒是沒有其他什麼別的目的，祇是讓人讀了之後，心裏頭有種重新拾回了什麼的落實感覺。如今的人寫情，少有寫得這樣刻骨的，尤其當讀到他們夫婦於兒女長成之後，兩人還是如此把握着每一個時刻，努力地相互生活着，斷守着，似乎在所有訴諸文字的文學型式當中，挺少有這般令人挑動心弦的。

如果說文學必需負有什麼使命的話，我想這也就足够了，倒也不必如佛學中小乘大乘的分成自渡與渡人那般，祇要一個作家本身能够將自己作誠摯的表現，自然能够影響到他人，令人接受的。

所以，當今有一批作家與批評家大力主張文學應該投身於社會改革之中，我倒覺得是一件極其可悲的事，至少梁實秋先生在「槐園夢憶」之中，已無意中做露了一個甜美的愛情生活，是那樣深，那樣誠，那麼容易的就擊入了人心，也許人的理性生活是比較苦難的吧？